

交通治堵期待走出“死胡同”

■本报记者 张巧玲

“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有点麻痺了。”当记者提及交通拥堵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显得有些无奈。

全国政协会议前,记者仅找到一份关于交通拥堵的提案。而在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中,记者也几乎没有听到有委员探讨交通拥堵的话题。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堵在路上”成了许多城市居民出行时的常态。但为何这个与许多人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话题在全国两会上鲜有人提及?交通治堵何时才能走出“死胡同”?

治堵须治本

“现在的交通拥堵问题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王梦恕认为,造成城市拥堵的根本原因是城市中常见的职住分离状态。

他告诉记者,许多大型企业原来都有自己的家属基地,比如洛阳因有许多上万人的大型企业,每天上下班的人潮非常壮观。

“如果职住分离,这些人将造成多大的交通运输压力可想而知。”王梦恕说。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贾利民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城市化普遍以摊大饼的方式进行,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所在。

“就近就业是解决交通拥堵的一个有效方式。”贾利民认为,避免建设大型社区和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城市建设中应该警觉的重要问题。

“现在主要通过修建地铁来改善交通拥堵状态。”王梦恕说,“以及通过限号、限行,使小汽车、公车被逐步淘汰,以控制汽车总量的方式减少道路压力。”

而除发展地下轨道交通外,王梦恕认为,还应推动地面轨道交

通,甚至空轨运输的发展,建立多层次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体系。

两会期间,民建中央在一份关于交通拥堵的提案中建议,要实施全国城市公交畅通工程。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吸引更多乘坐公共交通,才能减轻道路交通压力。”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七局)原主任(局长)乐美真同样认为,解决城市交通压力,主要是要抓公共交通。而发展公共交通的关键在于发展地下轨道交通。

他同时指出,中转不方便、不能形成网络化,是当前地铁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只有提高地铁中转的便捷性,才能吸引更多乘坐地铁出行。”乐美真说。

科技能否先行

“电子显示屏显示这条路不堵

车。”眼看着眼前的道路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出租车司机显得有些无奈。而刚刚路上的电子指示牌还显示这里的交通状况为“绿色”。

“其实我们一般不看这些电子显示屏。有时半个小时都不更新一次。”出租车司机说。

这是记者近日在两会采访中遇到的一幕。

面临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形势,众多科技手段被引入交通管理领域。虽然目前尚不成熟,但科技无疑将成为解决交通拥堵的“利器”。

“依靠科技帮助,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是治理拥堵的一个有效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道本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朱道本认为,相比靠加宽马路、扩建环路等增加道路容积率的方式,加强城市交通的科学管理对解决交通拥堵更为重要。

“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

并真正落实到位,才能真正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朱道本说。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提出了一份名为《加强汽车移动互联网的建设》的提案。

“这是治理交通拥堵、确保交通安全、防止空气污染方面最具前景的手段。”刘经南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北京等城市采取的限行、控制车辆总量等方式无法治交通拥堵之“本”。

“要以智能控制为主,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道路交通的拥堵和安全问题。”刘经南介绍,所谓汽车移动互联网建设,就是要做到将来每一台车、每个人、每条道路都实现全时空和全过程控制。

“现在的公路交通占了整个人员和物资运输量的90%。加强车辆、道路及人员的智能监控,有利于提升道路使用效率,有效解决交通拥堵和交通安全问题。”刘经南说。



为占领一个能拍到政协委员们走出人民大会堂场景的有利位置,摄影记者们提前展开了交锋。



政协会议闭幕之际,参与服务工作的礼仪小姐们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留念。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基层委员代表依米克·地瓦那一口气提交了25个提案。本报记者黄明明摄

记者手记

民主监督不是「急活儿」

■本报记者 张巧玲

为期11天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已于13日上午正式闭幕。在这11天里,委员们针对各种社会热点,以及改善政协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交了意见和建议。

对多数委员来说,他们已顺利履行完五年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但记者想问的是,会议结束了,民主监督也随之结束了吗?

两会采访中,记者见到不少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手里拿着厚厚的提案、议案或建议。看得出来,这些文稿并非来自一时的灵感乍现,而是经过了平时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群访,最后形成的意见精髓。

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每年都会提交若干件促进内蒙古地区发展方面的提案。她告诉记者,虽然曾在内蒙古生活了26年,对那里已算得上非常熟悉,但她每年提交提案之前,都要再多次回内蒙古进行调研。

不过,记者在两会采访中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答复:“我还没想好今年要提什么,过几天你再找我吧。”或“这个问题比较敏感,还是不说的好。”

这不禁令记者感到疑惑:这种突发奇想的建议和对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的态度,能起到民主监督的作用吗?如果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不能负起责任,又有谁能为民疾呼?真正的民主监督又何以体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曾在政协会上提出,除两会期间外,还应加强政协委员的日常民主监督职责。而在进行调研时,叶培建也给工作人员提出一个要求:凡是请客、送礼的,一律不接待。这样才能确保调研结果的真实可信。

人民代表为人民、政协委员行监督。民主监督不应只是十几天大会期间的民主监督,而应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记者认为,每一个代表或委员都应该像周秉建、叶培建这样,真正履行好自己应有的责任。

“农口”委员的期盼

■本报记者 黄明明

3月13日,阳光普照,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于今天闭幕。

人民大会堂前,没有了两会开幕时的围堵堵截,委员、记者,以及工作人员们其乐融融,纷纷合影留念。

五年一任的政协委员们即将届满,而除了轻松和不舍外,在他们心中更多的还是期盼。

“经过认真调研的提案交上去了,现在我就盼着能有一个满意答复,为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贡献一份力量。”一位“农口”的政协委员对记者说。

不仅是他,参加两会的每一位“农口”委员又何尝不是背负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希望来到这里,为了“三农”,为了中国的未来,建言献策,共商国是。

农业是立国之本。今年政协会议共收到提案6069件,涉及“三农”问题的提案有236件。

在这些提案中,加强农田水利、提高耕地质量、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增加农民收入、整治农村环境、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等内容,直指我国当前面临的核心“三农”问题。

新时期,新问题,新期盼。“农民有新‘九盼’。”来自河南

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长丰用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表达了农民的心声:一盼粮食“九连增”、二盼进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强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术送上门、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养老有保障、八盼校车放心乘、九盼乡村环境美。

经过多地调研,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胡旭晟总结道:“粮食要继续增收,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之道。”

作为政协闭幕的压轴之戏,“三农”问题被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会议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应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9时30分,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

虽然会议结束了,外地的委员们也即将离开北京,但他们的心已经留在了这里。这里,有他们的期盼。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将继续集中精力,围绕中央和地方重大课题积极建言献策。”已历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广西梧州政协副主席陈澄波如是说。

给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招”

■本报记者 潘希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入对小微企业的重视,地方政府要建一批有实力、有信誉的担保机构,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工银国际监事长王为强说。

今年两会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广泛关注,在经济界第34组的小组讨论中,王为强首先表示,发展担保机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良策。

尽管在银监会的指导下,很多银行做了大量工作,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介绍了德国的经验:德国中小企业经营良好,而其融资主要依赖公有制银行的支持。德国有几千家公有制银行,踏踏实实为中小企业服务,承担了全社会贷款的71.6%。

“它们不允许上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德国公有制银行的经营非常稳健”。李德水认为,德国的情况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

听了之前几位委员的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曹光佑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放宽民营企业进

入金融机构的门槛。金融机构要坚持重心下移,加大服务民营企业力度。”此外,他还建议进一步挖掘民资借贷潜力,促进民资借贷的阳光化。

说起民间借贷,会场上立刻热闹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是,当前民间借贷都是暗地进行,不够规范,存在很多风险。

针对这个问题,侯外林又补充说:“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这样既可以扩大就业,也有利于解决中小企

业资金困难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中小企业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有的企业主宁愿跳楼跑路,也不寻求破产保护,其背后原因非常复杂。

“不要歧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关键在于搞好诚信和法制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要通过透明立法来加强监督。

“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要结合起来,适度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可借鉴台湾地区经验,设立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职业培训、信用维护和道德培养。”刘明康说。

化解医患纠纷要靠第三方

■本报记者 龙九尊

“近年来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些流血事件。请问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缓解医患关系?”

在3月13日举行的“卫生领域代表答记者问”会场,一位记者提出的医患关系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兴趣。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

介绍,他把医患纠纷的原因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医闹”为职业的小部分人参与导致的;第二种是患者或家属认为治疗不好就是医方的问题,进而索赔;第三种是医方受制于目前医疗水平、或者医生医疗技术水平甚至医疗失误未能治好;第四种是少数医生责任心不强或有利益上的诉求。

针对不同原因引发的医患纠纷,王正荣认为解决方式也应不尽相同。如以谋取索赔为目的的“医闹”,应由公安和司法部门进行打击。而针对其他三类纠纷,“以前是主管行政部门参与解决,但效果并不好”。

“我们现在在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王正荣介绍,第三方包括法律、医学、社会学人士参与,他们将站在第三方立场,客观仲裁双方纠纷。如果医院错了,就赔偿患方;如果患方要求无理,就不得向医院索取赔偿。

“通过第三方仲裁机制,可以解开医患矛盾,进而减少医患纠纷。”王正

荣认为,此举可使医方从纠纷和矛盾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服务于社会。

“我非常赞成他的分析。”作为一线医生,全国人大代表、北大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魏丽惠对此有切身感受。她表示,尽管有临床路径、医疗常规,但仍有太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因此人们不能希望百分之百治愈,“包括现在使用的临床路径和医疗常规,也是从数百年现代医学里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此外,魏丽惠还特别提到,自己每天早7点到医院,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而她所在的科室中,40岁以上的医生都在吃降压药,很多手术室医生每天都在吃盒饭:……

“要想解决医患双方的问题,除医院要教育医生遵守职业道德外,也希望社会能多理解医生。”魏丽惠希望,政府能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同时,对医生的健康和待遇状况也给予关注。

两会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茅玉麟:

今年是本届政协的最后一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我的提案主要涉及民生问题。总体来看,提案办复比例很高,达到99%以上。我建议设立满意度的调查,我本人对以往的提案办复结果比较满意。

本次会议上我也提了一些和去年有一定连贯性的提案,例如赵州桥的保护修复问题。我建议加强政协委员在闭会期间的参政议政工作。这方面,科协界做得比较好,组织了很多调研,形成了报告,做了很多工作。

(本报记者潘希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医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迟宝荣: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是推进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医学教育存在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基层人才匮乏、临床实践教学难以保证等问题。

例如,医学教育扩招以后,教学经费严重不足,“实验动物由大变小,实验小组由小变大”,过度使用虚拟实验,学生缺乏基本的操作训练。

建议加强对医学教育的宏观管理,成立国家医学教育委员会,多部门协作,尊重医学教育的特殊规律,优化规模和结构,尤其要重视基层卫生人才的培养,切实加强学生职业道德和临床能力的培养,推动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

(本报记者张巧玲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发平: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存在着核心技术无法突破、电池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不长、车辆售价普遍偏高、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消费短期内很难显著增长。

从当前新能源技术来讲,混合动力汽车是节能减排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其技术成熟,最容易实现产业化,将成为解决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困局的重要手段。国家应给予大力支持,建立以节油率为指标的财政支持政策,提高我国混合动力汽车产业的整体水平,迅速对接国际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刘越山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陈炳德: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除了日用品、服装外,同样的商品,国外的价格远低于我国的。

广州同一厂家生产的酱油,出口香港的和生产给内地的,质量就是不一样。这里除了有税收制度的问题、汇率的变化以及进出口的标准不一样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观念的问题。

(本报记者黄明明整理)

让孩子们快乐学习

■本报记者 刘越山

记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了解到,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提案议案中有许多涉及到小学生的教育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校长方青表示,孩子不是学习的机器,不是投入多少就能产出多少。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转变育人理念。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特级教师郑捷则在两会现场抛出了一个问题: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学英语?在以后的工作中,又有多少时间来用英语?

现在小学三年级就要开设英语课,但各地经济发展不一,师资以及语言学习环境等多种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郑捷认为,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合理。

“最合适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郑捷建议,教育部门应根据孩子的个体情况,以及不同学校的不同要求来设置英语课程,以保证更多人才更快地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也表示,由于现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难以满足广大群众希望孩子接受较好教育的需求,因此许多家长安排学生参加各类培训。

目前,许多孩子的成长时光几乎都被英语、舞蹈、钢琴、小提琴、绘画等各色课程“侵占”,沉重的学习压力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

沈健表示,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共同努力,给孩子们一个愉快、激发兴趣、自愿刻苦学习的成长过程。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但如今的中国教育却正跟着社会的步伐猛跑,进入到追逐虚无的恶性循环中。

该是有所改变的时候了。